

万里同心路

烽火家国情

策划/林洁 黄丽娜 董柳
统筹/丰西西 周巍 李焕坤
文/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通讯员 何飞彪 李伟苗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福建集美，100多年前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如今已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知名侨乡。一个人的名字，被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他就是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毛泽东曾用这八个字赞誉这位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现厦门市集美区），17岁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经过20多年艰辛打拼，成为当地著名实业家，被称为东南亚“橡胶大王”。抗战爆发后，在陈嘉庚的号召组织下，800万南洋华侨为祖国捐款捐物，3200余名华侨青年驰骋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保障了“抗战生命线”的畅通。他在海外创办的《南洋商报》，成为当地华侨华人抗战的舆论中心和精神向导。1940年他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访问后，发出呼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远在异国他乡但一刻不忘祖国，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海外华侨“万里同心”的赤子情。

倾囊相助 纾难救国

陈嘉庚的故乡集美，曾是郑成功部队演练水师抗清驱荷的据点，民族英雄的故事在他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陈嘉庚的父亲早年在新加坡谋生，1890年，陈嘉庚应父召赴新学习经商，后成为南洋巨贾，纵横商界。他虽远在海外，但从未忘记祖国。他坚信教育是立国之本，在海内外筹办了多所中学校，知名学府厦门大学就是他创办的。

全民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掀起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当时已年过花甲的陈嘉庚也投身海外华侨抗战一线。

“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这是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向海外华侨发出的呼吁。

在他的号召下，近800万南洋华侨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在延安各界欢迎会上致辞（资料图片）

“万里同心——海外华侨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特展”上介绍的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支援抗战等事迹。

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皆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战，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增寄侨汇等方式，为祖国筹措军费和物资。仅1938年至1941年间，南侨总会为祖国抗战捐款金额就超过4亿元国币。

除了经济援助，海外华侨还积极捐助军需物资，比如药品、服装、车辆以及飞机、坦克、枪械等，极大缓解了战时物资上的燃眉之急。在当时国际援助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些款项物资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支柱。

南侨机工 驰骋滇缅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的“万里同心——海外华侨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特展”中，一封由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所写的《抗战家书》被放大在一整面展板上。这封信是她在1939年瞒着父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时，登报写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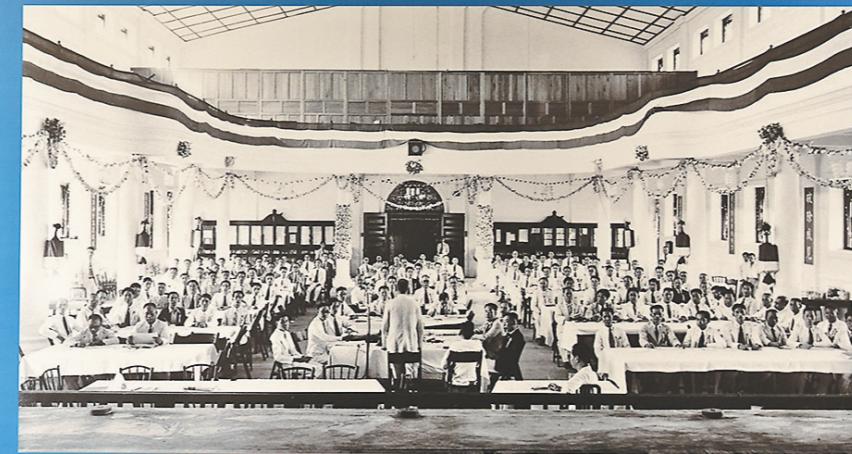
陈嘉庚

以巨大财力、人力、舆论之力支援祖国抗战，
获“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赞誉

倾资纾国难 丹心映山河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于新加坡，主席为陈嘉庚，副主席为庄西言、李清泉。南侨总会从财力、物力、人力上支援祖国抗战，成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大会在南洋华侨中学礼堂举行。

父母的告别信。

白雪娇，一位出生于南洋富商之家的闺秀，本可享受安逸人生，却在祖国危亡之际，毅然踏上烽火归途，奔波在滇缅公路上。白雪娇的故事是许多南侨机工的缩影。

南侨机工是华侨抗战史上不能遗忘的特殊记忆。1938年10月以后，中国东南的海路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当时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被称为“抗战生命线”。但公路建成后，急需大量的汽车驾驶员和修车技术人员。

彼时，在南洋的陈嘉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大会，并发出了《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呼吁“凡吾侨具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地华侨筹赈会或分支各会接洽”。随后，他还向东南亚各地筹赈会发送协助招募信函，并亲自动员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在他的号召下，陆续有3200余名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驰骋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

路上。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交通运输，保障了“抗战生命线”的畅通。1940年，陈嘉庚还两次率团到滇缅公路慰问南侨机工，鼓舞华侨抗战士气。

南侨机工们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向一线战场运送了近45万吨军需物资，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近半华侨青年为国捐躯，长眠于滇缅公路之下。

以笔为枪 舆论抗战

除了捐款、捐物，广大海外侨胞还发动抗日宣传，以纸为战场，以笔做刀枪，揭露日寇暴行，记录战争真相。

早在1923年，陈嘉庚就创办了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九一八事变后，他把《南洋商报》从午报改为早报，第一时间向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读者报道中国战事，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他还在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全民族抗日理念，发布抗战捐款倡议，号召华侨社会积极参与救国事业。1938年，汪精卫发布对日和

谈言论，陈嘉庚立刻发电报加以驳斥。“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陈嘉庚向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提交电报提案讨伐汪精卫的叛国行径，有力地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陈嘉庚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前方抗日将士，考察国内抗战形势。此行历时10个月，足迹遍布16个省份及以下。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9天的考察。在延安，他受到了热烈欢迎，与毛泽东等众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离开延安后，他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作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论断。毛泽东称赞他是“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周恩来称他的贡献是“抗战史上的丰碑”。

时至今日，陈嘉庚这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事业家留下的物质精神财富仍在滋养着我们。

暨南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院）主任、教授张振江：

中国发展离不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

羊城晚报：陈嘉庚为何会成为华侨抗战的一面旗帜？

张振江：陈嘉庚是一位广为人知的爱国侨领。在抗战期间，他作为南洋华侨的领袖，把南洋地区（包括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华侨华人全都团结起来，一起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这是他非常大的一个功绩。他不仅从经济上进行援助，还身体力行动员当时的华侨青年回国支援抗战，比如组建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3200多名华侨青年在他的号召下，来到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他们中有许多是富家子弟，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投身抗战。陈嘉庚团结带领南洋华侨华人，以巨大的财力、人力、舆论之力支援祖国抗战。所以毛泽东主席赞誉他是“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羊城晚报：陈嘉庚在抗战时期的爱国壮举，对当时国内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回顾这段华侨抗战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张振江：抗日战争激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之情，这是一种民族认同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抵抗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国家，当时的国际社会还没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基本上是在孤军作战。就此而言，海外华侨的作用十分关键，除了经济援助，他们还大力发动抗日宣传，让世界各国、让当地社会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本质。所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回顾华侨华人的这种作用，不仅在抗战中，时至今日，中国的整体发展和建设，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沒有缺席。特别是从抗战期间形成的这份“万里同心”的精神依旧在延续传承，广大海外侨胞尽其所能，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华南抗战 老兵记忆

策划/林洁 黄丽娜 董柳
统筹/丰西西 宋金峪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9月3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六名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受邀观礼。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开始前，习近平总书记登上城楼，走到抗战老战士老同志面前俯下身来，双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目光深情而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握着我的手，喊我老英雄，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9月中旬，在深圳福田，94岁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罗竞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依旧心潮澎湃，声如洪钟：“这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是对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关心，我要把伟大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9月3日，罗竞辉受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 受访者供图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罗竞辉：

铭记烽火岁月 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三次受邀现场观看阅兵

这是罗竞辉第三次受邀现场观看阅兵，前两次分别是在1999年和2015年。

“三次现场观礼，我都心潮澎湃。这一次格外震撼。”罗竞辉说，看着城楼之下，方阵如山、步履铿锵，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海上中队时，根本没有像样的武器，三条木船几乎就是全部家当，大海之上，大家挤在木船中，攥着老旧枪支，追击日本军船。

“跟当年相比简直天壤之别！”罗竞辉表示，各种新式武器装备让他十分震撼，真切感受到了我国国防的强大，“只有国防力量强大了，人民才能不受外人欺侮，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在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

“打东洋、打东洋，打倒东洋保家乡——东洋就是日本，唱着打东洋，我们就知道要抗日。”数十年过去，这位年逾耄耋、满头银发的抗战老兵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参加抗战儿童队时学习的歌谣，从未忘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惨痛。

1930年，罗竞辉出生于香港新界沙头角南涌罗屋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武工队秘密潜入港九，之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它是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在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

位于罗屋村的罗家祖屋，是武工队在香港的首个落脚点。日占时期，它是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及交通站。罗家祖屋的主人罗雨中是罗竞辉的堂叔，领武工队进村的则是罗雨中的弟弟罗汝澄。罗家祖屋有男女老少11人参加了抗战，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

受叔叔影响，罗竞辉13岁时就加入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小小少年在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他先后担任海上中队的通讯员和保卫员，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斗争。

“那时候，我们乘着木船在海上与日军作战，拦截日本运送军备物资的船只，保卫渔民生产，还传递一些情报。”罗竞辉至今记忆犹新：在海上作战不容易，要克服晕船，要学会“过船”，还要学会海上射击。训练时，战士们经常碰破脚趾、扭伤脚踝、磕伤膝盖，甚至掉进海里。在渔民的帮助下，大家渐渐学会摇橹、掌舵、放鱼炮、观气象。

首场战斗目睹战友牺牲

历经苦练，罗竞辉学会了许多本领，紧张又迫切地迎来了第一场战斗：1943年，深圳南澳西冲，“当时日本轮船停靠在海边，那天雾很大，日本兵上岸寻找食品和淡水，被渔民发现并报告我们部队。小队长刘捷和班长李金福组织我们一个班参加战斗。我们带着枪支和炸药包，坐上木船攻打日本兵，去炸日本的轮船。刘捷和李金福冲在最前面，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那是罗竞辉第一次直面死亡：“原来战争如此残酷！”

尽管海上中队最终炸毁了日本轮船，完成了任务，但罗竞辉的内心依旧非常难过，因为队长和班长永远离开了。“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武器很简陋，但我们还是战胜了他们！”他说，靠的就是革命精神，是大家齐心协力保家卫国的决心。

希望每一个人珍惜当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罗竞辉追随连长王锦北上，继续战斗。1946年，罗竞辉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12月至1950年10月，他在闽粤赣边纵队第二支队人民护乡团交通站工作；1950年11月至1991年8月，他先后在惠州市惠阳县、惠东县以及深圳市工作，曾担任惠东县工业局副局长、深圳市纺织工业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1991年9月，他离休返回香港。

今年7月，由航空母舰山东舰、导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及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的航母编队到香港开展访问活动，罗竞辉应邀登上山东舰参观。

如今，罗竞辉在深圳、香港两地居住，这是他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他每天都要看书、读报、听新闻，也十分注重养生。“现在每天都要去散步，深圳的变化很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城市绿化也很好。改革开放让深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罗竞辉说，千千万万人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珍惜当下，要热爱祖国和人民，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记者手记】

一句朴实的话语
一份深沉的嘱托

刚见到罗竞辉时，94岁的他精神矍铄，腰板挺直，胸前一枚枚勋章闪闪发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惊涛骇浪中与日寇周旋的少年身影。

时隔数日，再回忆起今年9月3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刻，老人依旧心潮澎湃。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对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集体致敬。我不禁想象：当他望向长安街上的钢铁洪流、热血军人，会不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会不会想起曾经的战友？会不会想与他们一同分享这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13岁参加革命，首战便目睹战友牺牲。我问他是否害怕，他坚定地说，敌人来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亲人，再怕也要战斗到底！从当年的三条木船到如今各种新式武器装备，他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

罗竞辉的女儿罗跃勤说，他闲不住，离休之后经常应邀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向香港的年轻人讲述抗战历史。这份坚持，是对他历史最好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深深的期盼。

临别时，老人执意相送。他反复叮嘱：“要告诉年轻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句朴实的话语，承载着一位抗战老兵毕生的信念，更是一份穿越时空的深情托付。我们唯有全力以赴，方能不负这般殷切期盼。